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葛剑雄 主编

冯友兰讲哲学

Feng Youlan Jiang Zhexue

冯友兰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哲学家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作了反思，又把他的反思用理论思维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的哲学体系。他是怎么说的，怎么写的，他的体系是怎么建成的，这都是研究哲人所首先要研究的，这就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真正读这位哲学家的这些著作。不做这种工作，而只抓住他的片言只字，新定他是个什么论者，从而批评之，这就是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用这种办法对待今人，必定造成冤、假、错案；用这种办法对待古人，必定写不出本来的历史。——《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点经验》

哲人的身世是哲人的品性之决定者；不研究哲人的身世，则无法理解哲人品性；哲人的哲学是哲人的品性之表现，无法理解哲人的品性，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哲人的哲学。所以为理解哲人的哲学起见，不得不把握哲人的品性；把握哲人的品性起见，不得不审查哲人的身世。只要能把握哲人的身世认识，则哲人的品性自明，哲人的哲学亦明。所以我们以为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之身世，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自期许者也。——《新原人·自序》

哲学家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作了反思，又把他的反思用理论思维的言语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的哲学体系。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怎么写他的体系是怎么建成的，这都是研究哲学史的人所首先要理解透彻的，这就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真正读懂这位哲学家的这些著作(想的，怎么说的，怎么写他的片言只字，就断定他是个什么论者，从而批评之，先用理解的，这就需要大量

冯友兰讲哲学

Feng Youlan Jiang Zhexue

冯友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友兰讲哲学 / 冯友兰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ISBN 978-7-5506-0088-1

I. ①冯… II. ①冯… III. ①哲学—中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846号

- 书 名 冯友兰讲哲学
著 者 冯友兰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88-1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总序

葛剑雄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得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讲课一直是传授学术的重要途径。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重在创新;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

中,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而且,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更适合普及的要求。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在引文方面经常有不符现代学术规范的现象,甚至有引文错讹之处。本次整理中均未作修改,以存学术著作原貌。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但20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有些虽未失传,却长期无人问津。直到近年,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但流传不广,今天更不便查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整理和出版(包括重版)名家的讲义、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目 录

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点经验	(1)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	(7)
一、钻研西洋哲学	(8)
二、搜集哲学史料	(8)
三、详密规划迹团	(9)
四、探索时代背景	(11)
五、审查哲人身世	(11)
六、评述哲人之哲学	(13)
新原人	(17)
自序	(19)
第一章 觉解	(21)
第二章 心性	(32)
第三章 境界	(47)
第四章 自然	(58)
第五章 功利	(71)
第六章 道德	(84)
第七章 天地	(100)
第八章 学养	(118)
第九章 才命	(131)
第十章 死生	(143)

新理学	(155)
自序	(157)
绪论	(159)
第一章 理 太极	(170)
第二章 气 两仪 四象	(188)
第三章 道 天道	(205)
第四章 性心	(219)
第五章 道德 人道	(238)
第六章 势 历史	(253)
第七章 义理	(263)
第八章 艺术	(275)
第九章 鬼神	(288)
第十章 圣人	(298)

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点经验

很有些青年同志要我谈治学经验，具体地说，如何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在这方面，我是有些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现在就从掌握材料谈起吧！

怎样算是掌握了材料呢？我把材料都收集齐了，比方说，买了很多很多书，算不算掌握了材料了呢？还不算。我把这些书都读了，算不算掌握了材料了呢？也还不算。只有不但是读了，而且是真正读懂了，那才算是掌握了材料。

怎样才算真正读懂了呢？司马迁曾经说：“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董老（必武）咏赞雷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诗中说：“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所谓“心知其意”，“得精神”或者说领会精神实质，都是指真正读懂了。不过这说的还不具体，我们还是就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具体情况来说吧！

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在这里有本来的哲学史和写的哲学史之分。我们常常讲事物的“本来面目”，哲学史也有其“本来面目”，它就是本来的哲学史。写的哲学史，就是研究本来的哲学史的人所写的研究成果，是本来的哲学史的摹本。本来的哲学史只有一个，而写的哲学史则有许多，哪一个写的最符合本来面目，哪一个就写的最好。

哲学家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作了反思，又把他的反思用理论思维的语言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的哲学体系。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怎么写的，他的体系是怎么建成的，这都是研究哲学史的人所首先要研究的，这就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真正读懂

这位哲学家的哲学著述。不做这种工作，而只抓住他的片言只字，就断定他是个什么论者，从而批评之，这就是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用这种办法对待今人，必定造成冤、假、错案；用这种办法对待古人，必定写不出本来的历史。

哲学史是一种专门史。研究一个什么事物的历史，就是要研究这个事物的发展。发展必有其规律，不会杂乱无章。发展必有其线索，有个来龙去脉。发展必有一定的阶段，有一定的环节。发展中的事物不是孤立的，必然受到它周围事物的影响或制约，而又反过来影响或制约它周围的事物。这些都是研究那个什么事物的历史时必须弄明白的。研究哲学史也是如此。哲学在历史中表现为各种派别，这些派别表示哲学发展的线索、阶段或环节，而且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这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是哲学发展的本来历史的固有内容，写的哲学史要把它们都写出来，特别要说明这些派别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历史前进。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得弄清楚这些问题，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得学习和研究。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也就算是真正读懂了。下面再进一步就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情况来说。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就其内容说，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但就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就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有所不同。其不同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中国的语言，拿汉语来说，原有的词汇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汉语的文字一直到现在还是方块的汉字，其来源是象形文字。这都不利于用字尾的变化表示词性。例如一个名词，有其抽象的意义，也有其具体的意义。从逻辑方面说，其抽象的意义就是这个名词的内涵，其具体的意义就是这个名词的外延。专门表示内涵的名词称为抽象名词，专门表示外延的名词称为具体名词。这种词性的不同在西方文字中，可以用字尾变化表示出来，使人一望而知。汉字就没有这种方便。例如“马”这个名词，就其内涵说是指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就其外延说是指一切马。有时要明确地专指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在西方的语言文字中，可以把马的字尾稍加变化，使之成为一个抽象名词。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可以于“马”字之后加上一个“性”字，以表示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称为

“马性”。但是中国古代没有这个办法。因为没有这个办法,所以在语言文字中就有困难。战国时期,公孙龙作《白马论》,主张“白马非马”。当时以及后来许多人认为这是诡辩,因为在常识中,一般都说“白马是马”。其实“白马是马”和“白马非马”这两个命题都是真的,并没有冲突。“白马是马”是就马这个名词的外延说的;“白马非马”是就这个名词的内涵说的。“白马是马”的马字是就具体的马说的;“白马非马”的马字是就抽象的马说的,它说的是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是马性。如果在古代就有一种方法,在文字上表明马性与马的不同,那么《白马论》中的有些辩论本来是可以不说而自明的,“白马非马”这个命题的意义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以前的中国哲学中,术语是比较少的,论证往往是不很详尽的,形式上的体系往往不具备。而且,以前的哲学家所用的是古汉语,即使是语录也记录的是古代的口语或方言,必须用现代汉语把它们翻译过来,才能为现代的人所理解。但是,有志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就不能靠别人翻译过日子,所以语言文字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训练之一。

在清朝末年,中国人开始把中国哲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开始重新反思的时候,人们就觉得中国哲学原有的术语很不够用。那时候,西方哲学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思想界。人们开始在佛学中找术语用。佛学中的相宗是一种烦琐哲学,其中名词繁多。当时,就有一派人用佛学中的概念、名词,来解释、评论中国哲学。可是那些概念、名词,有一部分是相宗那样的烦琐哲学的虚构,是如佛学所说的“龟毛兔角”之类。而且,佛学著作翻译过来的文字也还是古文,所以越说越糊涂。

中国哲学中一个名词往往有许多用法。例如“天”,可以指与“地”相对的“苍苍者”,也可以指“上帝”,也可以指“自然”。这就是术语缺乏的一种表现。一个名词的一个用法就指一个概念,用这个名词的人,究竟是想说什么概念呢?有些时候,可以从上下文一望而知,有些时候就不容易确定。

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比较容易多了。有许多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可以用来分析、解释、翻译、评论中国古代哲学。但是,翻译必须确切,解释必须适当。这也是不容易的。

中国古代哲学喜欢“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周敦颐为他的“太极图”作了一个“说”，只有一百多字。张载说的“心统性情”，程颐说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都只是提出一个结论。可能程颐认为他的《周易传》就是他的结论的根据，但还不是直接的说明。这些结论显然都是长期的理论思维的结果。研究哲学史的人必须把这种过程讲出来，把结论的前提补出来，但是这种“讲”和“补”当然不能太多。就是说，只能把中国古代哲学家要说而没有说的话替他说出来，不能把他并没有要说而在当时实际上不可能说的话也当作他要说的话说出来。既不太多，也不太少，太多了就夸张了古人的意思，太少了就没有把古人的意思说清楚，讲透彻。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少作正式的哲学著述。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史材料，大多是为别的目的而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记录的言论，可以说是东鳞西爪。因此就使人有一种印象，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没有系统。如果是就形式上的系统而言，这种情况是有的，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不等于没有实质上的系统。拿一部《论语》来看，其中所记载的都是孔丘回答学生们的话。学生们东提一个问题，西提一个问题，其问并无联系。孔丘东答一个问题，西答一个问题，其答亦无联系。孔丘并没有和学生们就一个专门问题讨论开来，深入下去，也许有吧，不过没有这样的记载流传下来。就形式上看，一部《论语》是没有系统的。就实质上看，还是有系统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就要从过去哲学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材料中，找出其实质上的系统来，用所能看到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要尽可能地符合这条龙的本来面目，不多不少。

总的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努力做到三点：

第一点，具体地弄清楚一个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哲学中的主要问题是共同的，但每个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是不完全相同的。哲学家各有各的思路，各有各建立体系的过程。所以，他们的体系各有各的特点。同是唯物论者，彼此不尽相同；同是唯心论者，彼此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各有各的历史地位。这些弄清楚了，才能具体说明一个哲学家的体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体系。决不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体系，分割开来，填入几个部门之中。那就像把

一个活人大卸八块,然后缝合,缝合即使成功,做到“天衣无缝”,但是那个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了。

第二点,必须具体地弄清楚,一个哲学家如果是对于某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他必然经过一段理论思维的过程。他可能没有把这段过程说出来。研究哲学史的人要尽可能把这段过程替他说出来,使学习哲学史的人可以得到理论思维的锻炼。

第三点,必须具体地弄清楚,哲学家所提供的世界观,使人们得到“受用”和教训。

以上三点,其实就是一回事。第一点做到了,第二点、第三点就自然有了。简单地说起来,学习、研究哲学史,对于一个哲学家,必须真正懂得:他想些什么,见些什么,说些什么;他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他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重要的是具体,因为历史的东西都是具体的东西。

这就叫做掌握了材料。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再寻找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对于哲学家的功过做适当的评论。上面的工作如果做得好,也许发展线索和规律就自然显现了,哲学家的功过也自然显现了。果能如此,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算是做到家了。

现在有些人说,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是注重掌握材料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更是注重掌握材料的。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不就是要掌握材料吗?问题倒在于,掌握材料的“掌握”里有个立场、观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很着重从一个哲学体系的社会效果,来对于这个体系以及建立这个体系的哲学家进行评价。在进行评价的时候,评价者的立场、观点问题尤为突出。

解放以来,许多哲学史工作者都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工作指针,我也不例外。这种愿望,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运用了。就我个人的经历说,尽管解放以后真心实意地学习这种新的立场、观点,但是我的立场、观点究竟转变没有?转变的怎样?自己却难以作出判断。可是,我还在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必须作出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既然难以判断自己的立场、观点如何,也就无法相信自己了,只有模仿别人,依傍别人了。

所谓“别人”，先是苏联的权威，后来是党内的权威。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就向苏联“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然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进行类推和比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付对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顿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恢复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必须是自己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这在中国的传统中叫做“修辞立其诚”，也就是从肺腑中来，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子摹画来的。在一次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作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现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照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我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收入《怎样学习哲学》，1985年6月出版）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

欲知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须先知中国哲学史一辞之歧义。中国哲学史一辞有二义：一是指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一是指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纪述。此二义差别甚大：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前者是不成文的，后者是成文的；前者是实际的事情，后者是语文的表达；前者无是非，后者有是非；前者是后者之对象，后者是前者之写照；前者之例，如所谓“哲学在中国历代实际发展之事迹”，后者之例，如胡适之先生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若欲用二名表此二义，则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可名为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纪述，可名为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即写的中国哲学史）。

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实说不上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才说得上研究。据此，可见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问题，不是问的怎样研究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而是问的怎样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亦即不是问的怎样研究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纪述，而是问的怎样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问题，既只是问的“怎样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既只是问的“怎样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则就可知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或“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之方法，便是研究中国哲学

史之方法。这种方法,就其荦荦大者而言,则共可区别为六种:

1. 钻研西洋哲学;
2. 搜集哲学史料;
3. 详密规划迹团;
4. 探索时代背景;
5. 审查哲人身世;
6. 评述哲人哲学。

这六种方法便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方法。以下我们便依次论解这六种研究中国哲学史之方法。

一、钻研西洋哲学

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若不研究西洋哲学,则我们整理中国哲学,便无所取法;中国过去没有成文的哲学史,若不研究西洋哲学史(写的西洋哲学史),则我们著述中国哲学史,便无所矜式。据此,可见西洋哲学史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打算把中国哲学整理出一个形式上的系统,就得首先钻研一些西洋哲学。研究西洋哲学,可分四方面:

第一,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形式逻辑;第二,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哲论;第三,须精读三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专论:一形上学,二人生论,三认识论;第四,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西洋哲学史。其中理由,则为篇幅所限,不能涉及。

二、搜集哲学史料

哲学史料是组成哲学史之细胞,没有这种细胞,当然也就不会有由这种细胞所组成的哲学史。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史,除应首先研究西洋哲学外,就应首先搜集有关于中国哲学史之各种史料。有关于中国哲学史之史料,共有三种:一是原料,二是副料,三是旁料。兹请分别释之。

第一,原料。中国哲学史之原料,即中国历代哲人自己之著作;如朱子的《语录》,周子的《通书》,邵尧夫的《观物篇》,释宗密的《原人论》,智

颀的《摩诃止观》，董子的《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搜集这类哲学史料，得经四层手续。第一层手续是全部浏览，将中国历代凡带有哲学气味的著作，不分好歹，一律加以涉猎。第二层手续是严格遴选，遴选的标准是“具有哲学内容，中心观念，与特殊见解，而并出之以理智的辩论”，合则取之，否则弃之。第三层手续是考辨真伪，“古今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则必滥引失真”。如《易·系辞传》，旧说孔子作而实非孔子作。《大乘止观法门》，旧题慧思作而实非慧思作。若不详加考辨而一仍旧贯，则便有紊乱进化系统，颠倒事实是非之危险，辨伪法前人论之已详，这里没有多讨论的必要。第四层手续是整理会通，整理会通有两方面，一是文字上的校勘注释，一是思想上的提纲挈领，关于校勘等法，这里也因篇幅限制，不能多讲。

第二，副料。中国哲学史之副料，即别人所作有关中国历代哲人与其哲学之著作，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班固《汉书·艺文志》等都是。这种史料有补助原料不足之功用；如果一哲人的原著散佚，便可引用此类哲学史料，补其缺憾，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搜集这种哲学史料。从副料中搜集原料的工作，便是所谓“钩沈”或“辑佚”。

第三，旁料。旁料一辞，是我们杜撰的；因其异于原料副料等正面哲学史料，故取旁征博引之义，名之曰旁料。中国哲学史的旁料，即中国历代的正史和野史，如《廿五史》、《世说新语》；和近人所作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经济史等等都是。在这些“史”中，我们可以见哲人的时代背景，及哲人的品性身世。哲人的哲学，是哲人的品性之表演，是哲人的时代背景之反映。不深知哲人的品性，则不能深知哲人的哲学。不深知哲人的时代背景，也不能深知哲人的哲学。欲深知哲人的哲学，就得深知哲人的品性与背景；欲深知哲人的品性与背景，就得多读正史与野史。所以我们以为中国的正史与野史，是中国哲学史之旁料；所以我以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当首先搜集这种哲学史料。

三、详密规划迹团

“迹团”一辞，系酌采自梁任公先生，乃“事迹集团”之简称，将欲用以

表示整个的“哲学在中国实际发展之事迹”中之一小段事迹。中国哲学事迹，绵延二千数百余年，历久不替；若不把它区划为许多比较小的迹团，则我们研究时，便要感觉到许多“无从着手”之困难。梁任公说的好：“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分之断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亦如此。所以我们以为详密规划中国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乃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初步入门的方法。划分中国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其方法有三：一分期，二别派，三明域。下分三层叙述。

甲，分期。分期是“规划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之一种方法，亦即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方法。适当的分期，不但能便于研究，而且能显示出哲学的进化之系统，发展之阶段与演变之方法。分期的标准是“哲学思潮起伏的段落”或“历史的类型”。根据这种标准，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上古的子学与中古的经学两个时期；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上古哲学、中古哲学与近世哲学三个时期；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上古的纯中国哲学，中古的印度化哲学，近古的中印合的哲学，近世的先秦化哲学，与现代的欧美化哲学五个时期。有时，我们或者还要把这几种分法中的许多大时期，再分为若干小时期。分期不可任意，必须适得其当。

乙，别派。一个时期中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哲学家，一个时期中的許多不同的哲学家，可以分门别户，联合而为几个不同的大派别。研究中国哲学史，若不把各时期中之哲学界所含的各宗各派，指示清楚，区辨出来，则我们对于当时的哲学界之情势，仍必“如入五里雾中”，手足无措。所以我们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次于分期，应当别派。别派的标准是“师承关系与思想类似”。有师承关系者则划归一派，无师承关系者不划归一派；思想类似者则可划归一派，思想不类似者则不可划归一派。前者之例，如朱子与程子，孟子与孔子；后者之例，如惠施与墨子，庄子与老子。别派研究法，亦可称作“宗派的研究法”。这种研究法具有两个好处，在积极方面可得一种铺叙便利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免一切拖泥带水的劣迹。

丙，明域。明域者，确定一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所分布的区域之